

中国传播学与乡村研究的再思考

林莉君

摘要: 重思中国传播学研究, 乡村问题应该成为整个学科的重要出发点之一。具体来说, 乡村研究是历史和社会中的“人”之研究的重要议题, 民间信仰仪式研究开辟了传播学对乡村研究的新途径。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构成, 通过对民间信仰仪式的传播研究, 可以为研究文化的本质、作用、产生、传播和变迁带来很多启发, 它展示的是对一个文化意义的传承和现时化形式。

关键词: 中国传播学; 乡村问题; 民间信仰仪式; 仪式音乐

作者简介: 林莉君, 女, 副教授, 音乐学博士, 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后。(杭州师范大学 钱江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36)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552 (2017) 01-0042-04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不能脱离于人类传播而存在, 反之, 人类传播不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 二者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正如“传播学的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一早就提到的:“在人类生活中, 传播学的大门几乎都向每个角落敞开着。传播学研究者可以穿过任何一个大门。”^[1]也因此, 我们似乎可以认同部分学者所说的“传播研究已成为世界景观”的事实。

然而, 回首过往, 我们不得不说传播研究的视野窄化, 已经陷入窄小的大众传媒以及城市中心主义偏向的胡同。看看发源于美国的传播研究, 威尔伯·施拉姆所创建的传播学学科的研究旨趣, 一开始就关注于广泛的人类沟通, 把传播学的本质界定为一切社会交往活动或社会关系的基础, 欲为建立以多学科汇聚, 具“统摄性的传播科学”。但其后来似乎放弃了原有的尝试, 转而聚焦于狭义的大众传媒研究, 这也已是传播学界的共知。之后其他学者亦承继以大众传播媒体为中心的研究, 进而成为传播研究的主流。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一早就指出, “大众传播学”这一称谓十分有害, 原因之一是它把研究仅仅局限在一些如广播、电视、电影以及被误称的“通俗文学”等特定的领域, 在研究上产生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局限, 也带来了某种盲目。他认为, 我们自以为是“大众传播”研究极其严重地损害并扭曲了传播学研究。^[2]这种长期以来一直以大众传播媒体为中心的研究状况虽然在近十余年来随着新传播技术革命的兴起逐渐有所改观, 但总体来说仍缺乏理论的自觉性和系统性。^[3]

回观中国内地的传播学研究, 从主体上看, 基本是美国式传播研究的翻版, 大众传播研究一开始便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界占有主流地位。^[4]究其原因, 一方面跟中国早期传播学学者大都为新闻学背景的学术经历有关, 自然最关心大众传播研究, 这一说法为传播学界多数学者所认同。^①另一方面, “言必称西方”、一切以西方观念为依据的学术情结或也是其重要原因, 当然, 这一状况不只存在于传播学界。由此, 在传播学传入中国的第一个阶段, 传播学似乎被等同于大众传播研究,^②以至于不少学者对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5年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浙江民间仪式音乐与区域社会——一种传播生态学的视角”(15DD32), 以及2014年浙江省博士后科研项目择优资助项目“浙江区域‘胡公信仰’仪式音乐研究”(BSH1401023)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也有学者并不完全认同。比如胡翼青认为, 大众传播研究迅速成为传播学研究重点的根本原因是, 大众传播可以被直接运用于当时的社会实践, 尤其是处于转型期的新闻业改革实践。参看: 走向专业化: 中国大众传播研究30年 [A]. 王怡红、胡翼青主编. 中国传播学30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 292-305.

^②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 主要是媒体分析、受众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等层面。已有学者对此做过总体的梳理归纳, 其中以胡翼青的陈述较为详实。具体可参阅: 胡翼青. 专业化的进阶: 中国传播研究30年 [J]. 淮海工学院学报. 2009 (4); 胡翼青. 走向专业化: 中国大众传播研究30年 [A]. 王怡红、胡翼青主编. 中国传播学30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 292-305.

“传播学”有严重的身份危机感，开始反思中国传播学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下一步将何去何从？

二、本土化反思：传播学与乡村研究

本土化反思是传播学界争鸣中最具影响的话题，^①近年来学界更进一步的呼声是：中国传播研究要有主体性和问题意识，要向“传播本位”回归。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如刘勇通过反思中国传播学二十多年的研究，认为学界存在的一个显著问题是“想像力的缺失”，这其中主要表现在研究者缺乏质疑精神与问题关怀，研究基点忽略“人”本身。^[5]吴飞亦提出，传播学需要关注一些人类普遍关心但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他认为，无论我们有怎么样的理论与方法论偏好，传播研究的潜能是聚合于传播所赖以进展的当今社会，直接地从多重角度分析与批判当今社会。^[6]诚然，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服务于人类自身，其根本实质当是寻求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探究。

批判性的反思还体现在部分海外华人传播学者身上。如执教于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院的赵月枝指出，中国传播学研究都是以媒介为中心（media central），只研究新闻媒介、信息媒介，并没有把媒介的意义扩展到符号的表达，更不用说音乐的表达。而且现在的传播研究忽略农村，研究与农村无关，整个就是理性主义和认知主义的偏见。^②她发问道，中国至少有一半人口是农民，而国内有几个学者做农村传播研究？我们传播研究观照的是什么？^[7]作者借其受聘国内长江学者之际，把“文化、传播和中国城乡协调发展”作为自己最主要的研究方向，她强调说：跳出媒介中心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偏颇去研究传统知识的继承，是事关当下农村文化领导权重建和农民主体性重建的一个重大问题。现执教于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媒介与传播学院的华人传播学者黄成炬，对其2007年撰写的《媒介社会学》一文进行自我反省，他认为传播学的研究应由“媒体本位”向“传播本位”回归，走向广义的传播社会学。他指出，传播学的立学根基是作为构成人类社会基本要素之一的人类传播实践的普遍存在，而这种传播实践并不因媒体的存在而存在，这里的传播是指最广泛意义上的人类传播实践，其本意是人们使用相应的媒介（大到大众媒介小到人体发声器官及肢体语言）进行彼此间的交流。作者强调说，传播学不应再囿于传统的媒体与社会之关系的狭隘范畴，而必须走向更为广阔的传播与社会之关系的新天地。^{[3] (333-334)}

上述反思其实已指明了传播学研究的方向——即“人”应该是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历史和社会中的“人”的研究是方向正确的“人”之研究的坐标点。正如米尔斯（C. Wright Mills）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所强调的命题：要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其基本特征是关注历史中的社会结构，而且它的问题是与紧迫的公众论题和持续的人类困扰直接关联的。^[8]所以，传播应该回归于“人”，回归于“民”，回归于人类之历史—社会的传播行为而非仅仅限于大众传播媒体的传播行为，如果传播学一味在主流框架里打转，整个传播研究不可能生出新的活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历史实践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对于我们中国而言，在经历了改革初期的繁荣之后，在二十多年的中国政治经济转型中，“三农”问题凸显，“乡村问题应该成为整个学科的重要出发点之一。”^[9]当然，这并不是说传播学界没人研究乡村，事实上，在国内也有部分学者深入乡间，关注传播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比如郭建斌就是其中一位颇具代表的学者，自从2002年开始博士课题研究以来，一直深入田野，坚守于云南、西藏少数民族乡村的传播研究，成果颇丰，^③为学界所关注并提倡。在他的带领下，云南大学也有了一批做类似研究的追随者。但是这一研究路径主要基于传播媒介与乡

① 传播学界“本土化”的思想源头可追溯于1982年，自1993年开始正式推出传播研究本土化的论题，迄今研究成果甚丰。已有学者对此做过较为详细的梳理，在此不赘，具体可参阅：张威．探索与立场：30年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五次争鸣 [A]．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476-480。

② 2015年5月7日，赵月枝教授回家乡缙云之际在杭州停留一天，并与浙江大学传播所部分师生一起相聚畅谈，笔者亦参与其中，这是引自当日的谈话内容。

③ 主要论著有：郭建斌．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 [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郭建斌．边缘的游弋：一个边疆少数民族村庄近60年变迁 [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郭建斌、冯济海．中国白族村落影像文化志·沙朗东村 [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郭建斌．寻找“格桑梅朵”：西藏昌都地区流动电影放映田野研究实录 [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村社会的互动关系,且并没有在中国主流传播学中得到继承和发展,至少可以说在目前还处于传播学的边缘地带。^①

三、传播学与民间信仰仪式研究

如果说,乡村研究是历史和社会中的“人”之研究的重要议题,那么,民间信仰仪式研究当属传播学对乡村研究的新途径。

我们已知,仪式是一个具有理解、界定、诠释和分析意义的广大空间和范围,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话语”,^[10]以至于长期以来一直被人类学家当作观察人类情绪、情感以及经验意义的工具,^[11]并被视为一种思想和民族志范本的重要对象。由此,仪式被国际学术界许多不同领域视作文化分析新样式的一个重要焦点。除了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宗教历史学家之外,社会生物学家、哲学家、思想史学家也都转向了把仪式看作文化动力的“窗口”,通过这扇窗口人类可以认知和改造世界。^{[10](3)}

中国自古称之“礼仪之邦”,亦有“制礼作乐”之典范,“礼”已经成为建立华夏文明之文化秩序的一种象征,要了解这一古老的文明体亦不能完全撇开仪式。^[12]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从社会看文化,才可把握真正的活的文化之一面相”,而“中国社会形成的主要要素只是‘礼’”。“在中国,最初的仪式就是人与天相接、人与神相接所采取的一种方式 and 行为。”^[13]这一信仰仪式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成分,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影响着大多数民众日常生活的生产实践和社会观念。“有礼则不可无乐”,仪式作为信仰的外向展现,其中一个重要组成因素是伴随着整个仪式展现过程的声响(包括音乐),这些声响在信仰仪式活动中的运用及其功能,对于我们认识信仰仪式的文化内涵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14]中国传统音乐的源起、生存、发展和传播,大都与信仰和仪式行为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思想中的)信仰和(行为中的)仪式是大部分中国传统音乐的生存土壤(或所谓的“文化语境”)。^[15]这些也已是当下音乐学界普遍的认知。^②

从传播学界来看,少有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③对民间信仰仪式及其音乐展开专门研究更为少见。但是发人深省的是,恰恰是对这一传统文化的研究,可以为研究文化的本质、作用、产生、传播和变迁带来很多启发,它展示的是对一个文化意义的传承和现时化形式。民间信仰仪式及其

① 一些院系和学者在乡村社会的传播研究上做出了一番努力。如云南大学新闻系在1997年建系之初,携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立足于本土展开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实乃一项较大规模的乡村信息传播研究。2009年8月,云南大学再度与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共建“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开展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其中有乡村传播研究成果。再如2015年3月26—30日,赵月枝牵头,由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国情调研缙云基地、缙云县政府、河阳乡村研究院联合主办了《“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暨《中国批判传播学第二次年会》,以“建构平衡互哺的城乡关系”为主题对乡村传播进行了研讨。

② 中国的仪式音乐研究已成为音乐学界一个至关重要的研究领域,甚至可以说是一门“显学”,其成果丰硕、影响巨大。研究成果中,虽有部分学者在对仪式音乐个案进行研究的同时亦有涉及传承、变迁的话题,但是甚少展开仪式音乐传播的专门研究。从我国音乐学界的音乐传播研究来看,主要萌发于20世纪80年代,于90年代进一步探索,在21世纪进入发展期。研究面向较为多样,涉及有古乐流传研究、音乐传播学的方法与理论思考、音乐传播学学科建设的思考、基于传播学方法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音乐传播的概念与功能思考,以及音乐传播教学、大众传媒中的音乐传播、音乐文化产业、当代流行音乐研究等相关研究。主要可参看:修海林.古乐的沉浮——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考察[M].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修海林.音乐学领域中的传播学研究[J].中国音乐,1993(2);薛良、宋莉莉.“音乐传播学”引言[J].中国音乐,1993(1):68-69;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J].人民音乐,1996(1);冯光钰.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播变迁与“同宗”现象[J].中国音乐,2003(2);冯光钰.传播学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9(1);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概论——当代社会音乐生产体系运行研究[M].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③ 传播学界相关的专门研究虽少,但不乏关注者。如邵培仁教授早已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繁荣问题,认为需要“探寻和坚守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和核心元素”。在探索本土传播学研究的进路与策略中,他提出“寻根主义:反向的学术探寻与追溯”的理论思考。在研究实践中,邵培仁教授以中国媒介实践活动中的民俗传播与节日(庆典)仪式传播为例,深入探寻大众传媒与文化认同建构之间的意义及关系。(具体可参阅邵培仁.增强中国文化国际竞争力的几点思考[J].新闻记者,2010(11):14;邵培仁、林群.中华文化基因抽取与特征建模的探索[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邵培仁.华人本土传播学研究的进路与策略[J].当代传播,2013(1);邵培仁、范红霞.传播仪式与中国文化认同的重塑[J].当代传播,2010(3);邵培仁、姚锦云.寻根主义: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建构[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3(4),等等)

音乐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构成，作为文化记忆的范畴，研究意义非同一般。让我们重视中国当今现实，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信仰在民众（特别是乡村民众）的生活中重新蔓延开来，从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趋向。究竟如何看待和处理民众生活中民间信仰的存在和流传问题，实际上一直是政府部门，特别是我们现行体制下管理者和思想文化工作者十分棘手的问题。^[16]可知，民间信仰仪式及其音乐的传播研究当是中国文化现象中非常重要的、需要深入认识的问题。

我们已知，中国文化认同的一个主要标记是“信仰体系”。信仰体系由属于“思想”范畴的“信仰”和属于“行为”范畴的“仪式”组成，通过解析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以及“思想—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获得对人类文化或“人”的宏观认知，这便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对人类文化研究所探寻的根本实质，^[17]对于传播学学科而言，亦然。

四、小 结

作为三十多年前从国外全新引进的传播学并非承继中国传统知识体系，我们该如何观照传播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维度，是一个需要重新反思与自觉的重要命题。笔者以为，或许可以用凯瑞的一段话来作为这篇文章的小结：“我还是希望既不要否认也不要嘲笑大众传播的研究传统……我只想说，受过专业训练的知识分子尚有未竟的使命，也就是还有第三种看待传播学学术目标的途径。”“研究传播就是为了考察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理解和使用这一实实在在的社会过程。文化研究的目标远比其他研究传统来得平实，它不是以支配人类行为的法则来寻求关于人类行为的解释，也不是把人类行为消解为其所基于的结构中，而是寻求对人类行为的理解……因此，至少从文化学常常更忠实于人的本性和经验这点看，把传播学的目标设想为文化科学较为适合，且更具人性。”^{[2](37)}

概而言之，“一个世界，多种声音”，一个丰富的世界是由各种在地知识建构起来的。我们应该推动在地知识的建构，推动文化研究的在地化，让文化研究接上地气，落地乡村，让传播学真正走向“文化研究中国化”。

参考文献：

- [1] [美] 威尔伯·斯拉姆. 传播学的一个独特见解——一个观点的回顾 [J]. 姜克安译. 国际新闻界, 1985 (2): 27.
- [2] [美] 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 [M]. 丁未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25-26.
- [3] 黄成炬. 媒介社会学向传播社会学的转变 [A]. 洪浚浩. 传播学新趋势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332-334.
- [4] 吴飞. 重建巴比塔——吴飞谈传播学的想像力 [M].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4: 9.
- [5] 刘勇. 想像力的缺失: 中国传播学研究反思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6 (6): 84-86.
- [6] 吴飞. 传播学研究的自主性反思 [J].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2): 124-125.
- [7] 赵月枝, 胡智锋. 价值重构: 中国传播研究主体性探寻 [J]. 现代传播, 2011 (2): 20.
- [8] [美] C·赖特·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像力 [M]. 陈强, 张永强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4, 20.
- [9] 沙垚. 重构中国传播学——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赵月枝教授专访 [J]. 新闻记者, 2015 (1): 5.
- [10] [美] Catherine Bell. *Ritual Theory, Ritual Practice*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
- [11] [美] 乔治·E. 马尔库斯, [美] 米开尔·M. J. 费彻尔. 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 [M]. 王铭铭, 蓝达居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92.
- [12] 彭兆荣. 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 1.
- [13] 钱穆.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九) [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 76, 80.
- [14] 林莉君. 多元信仰之声音: 以磐安县仰头村为个案的“炼火”仪式音乐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76, 80.
- [15] 曹本冶. “序” [A]. 林莉君. 多元信仰之声音: 以磐安县仰头村为个案的“炼火”仪式音乐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
- [16] 陈勤建. 当代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 [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13: 4.
- [17] 曹本冶. 思想~行为: 仪式中音声的研究 [M]. 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8: 3.